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高星：

水洞沟是一个不断带来惊喜的地方

■本报记者 张雪梅

“水洞沟是一张文化名片，已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它的重要意义是为我们揭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发生的人群的交流、迁徙、融合，以及人类对特定环境变化的适应。而这些发展变化最后都融入了我们的文化，融入了我们的血液之中。”8月11日，在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荣誉主席高星表示，“水洞沟发现100周年，应该说是学术界，尤其是考古界的一件大事儿。因为从遗址的发现、发掘到研究，能够经过100年，而且不断出台成果，能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发现用火痕迹， 水洞沟人规模较大

“水洞沟是一个不断带给我们惊喜的地方！”20余年不间断发掘，也不断取得重要发现，无论是多种类型、技术独特的石制品，还是动物化石，都让高星和团队欣喜不已。

“当时在第二地点看到有一处剖面，土被烧红，像砖一样，我们知道那是人类集中用火的地方，能够留下砖红土，说明用火的时间非常长。”2002年，高星在水洞沟第二地点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了古水洞沟人用火的痕迹。

“当时做过标记，但再来发掘的时候，带给我们的却是极大的遗憾。”2003年，高星来到水洞沟遗址时，当时的剖面很大一部分已经坍塌，非常重要的一些遗物遗迹已经消失。

虽然继续发掘这个地层的时候，又找到一些用火的遗迹，有灰坑，有一些烧得发红发黑的土，但再没找到那种厚的、烧成砖红壤这样的遗迹，这让高星和团队成员意识到水洞沟遗址发掘的紧迫性。

“因为有火，他们要在这过夜，也可能在这过冬，所以它就不是一个临时狩猎、采集或者制作石器的场所，而是一个生存的大本营。”因为有大量火塘，说明当时这里的人群规模比较大，而且大量用火，连续在这里生产生活。”每每说到这些，高星都难掩兴奋之情，“我们找到了核心的遗址区。”

现代烹饪技术 “石煮法”， 水洞沟人早在用

在对古水洞沟人用火的不间断研究和分析期间，高星还发现了一些独特的现象。有些石头是被火烧过，但火烧是为了改变石头的质地，从而更好地制作工具。高星表示，“当时的水洞沟人非常聪明，就像我们现在用火来炼钢、煅烧，包括给陶瓷定型的技术，都源于这种用火处理石头的方法。”

在水洞沟第12地点，高星有更惊喜的发现。有些石头烧过以后，放在水里，然后把水烧开，将水里的食物煮熟。“这种被我们称作‘石煮法’，是一种很现代的烹饪技术，让我们感到很大的惊喜。”

发现大量装饰品， 水洞沟人很爱美

另外一个惊喜来自高星多次讲过的鸵鸟蛋皮串珠装饰品。刚开始调查的时候，偶尔在剖面下面捡到圆圆的像纽扣一样的东西，中间有孔。刚开始觉得很惊讶，后来在第二地点一次发现了数十枚。在显微镜下观察后，才发现它们竟是用鸵鸟蛋皮制作的，而且上面有钻孔，有磨圆，甚至还被火烧过、染过色。经过反复研究发现，这是当时人有意利用鸵鸟蛋皮来加工制作的装饰品。“‘爱美的水洞沟人’就是由此而来的。”

高星推测，大量装饰品的出现，很可能是古人到这个地方生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有鸵鸟在生活。这不仅当时人对美的追求，也可能是对族群身份的认同。而且，制作这种串珠，很可能已形成了一种手工业的“产业链”，也可能是与其他族群进行交换和贸易，来获得一些生存的资源。

（下转07版）



首届旧石器考古高级培训研修班。 宁夏文物考古所供图



水洞沟遗址博物馆。 水洞沟景区供图



在水洞沟博物馆门口，高星和老朋友合影。



高星为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欧阳志山介绍水洞沟遗址发现百年活动。

我的头发是在这儿变白的

本报记者 张雪梅

“我的学术生涯大部分是在水洞沟度过的，我的头发也是在这儿变白的。”8月12日，参加完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高星回到水洞沟时，和景区工作人员热情地握手、寒暄、合影。

“我在水洞沟遗址工作了20多年，算是老资格了。”从2002年开始，连续20年不间断地在水洞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高星早已把自己当成水洞沟的一名工作人员了。

在他心中，水洞沟遗址是一个多元素、多维度的文旅资源和考古研究圣地，4万多年前人类在这个地方生存、演化并且留下遗物和遗迹，构成了中华远古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带领我的学生，还有国内很多同行都在这里挥洒过汗水，流过心血，这里既有学术的收获，也有情感的收获。”和严肃的学术交流不同，说到与水洞沟的渊源时，高星脸上堆满了笑容。在水洞沟考古发掘的20余年中，高星所带的团队中，至少有两对学生在这儿相遇、结缘、结成夫妻。“看到孩子们在这里成长，在工作中相识相爱，而且还在业务上共同进取，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收获。”

“水洞沟遗址是我学术生涯的重要殿堂，也是我情感的所在地。就是这处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我们获得了很多学术上的收获，发现了很多材料，也发表了大量论文著述。”

一个世纪以来，水洞沟遗址共进行了6次大规模发掘。1963年开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裴文成先生带领科研队伍赴水洞沟，持续开展了多轮发掘。2000年，高星从美国留学回来，在旧石器领域深耕。2002年—2022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队，在水洞沟遗址及周边地区开展系统的考古调查，高星带领团队，开始了对遗址核心地点持续20年的新一轮发掘与研究，主动发掘工作依次在第2、7、8、9、12、1地点进行，期间还承担了为配合基建项目而对第3、4、5地点的清理发掘。这些发掘与对相关的样品测试、出土材料分析，使研究者对于该遗址的分布、形成过程、地层序列与文化时代，古人类的技术特点、演变和生存适应行为模式等诸多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诸多问题有了明确的答案，获得前所未有的资料、数据和成果，水洞沟这片土地上的古老秘密被渐渐揭示。

同时，水洞沟也是高星培养学生最主要的野外课堂。“水洞沟遗址是科研的基地，也是人才培养的基地。”他不仅在水洞沟延续田野课堂，每年继续招募、培训新一代旧石器学子，还在2021年承担起国家文物局旧石器时代考古高级研修班的培训任务，作为班主任组织了从授课、培训到发掘、整理的全部工作。“我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在这个遗址实习成长起来的，现在他们很多都变成大学教授和研究员，成为学术带头人。”高星表示，相信这种科学的作用，人才培养的作用，日后还会不断地发扬光大。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张雪梅摄

高星。